

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

——评《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黄智虎◎

【内容提要】 全球化问题学者巴雷特所著《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一书可能会是全球公共产品研究中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本文在回顾有关全球公共产品学术脉络的基础上，介绍和评述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从理论与政策角度总结了该书的贡献，认为该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其价值是具有示范性的。同时，本文认为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尤为关键的是，概念外延的过大使该主题的研究难以持续深入。对于目前时代来说，对全球公共产品的研究仍要向具体化方向推进。

【关键词】 全球公共产品 动机 国际合作

全球公共产品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界近年来比较关注的一个课题。对全球公共产品的研究，一般都是以相互合作为起点，以国际机制为目标。是否具备动机是合作能否达成的基础，但全球公共产品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答案的多样性。试想一下，假如一颗直径 10 公里的小行星即将与地球相撞，各国会产生合作的动机吗？当然

* 本项研究得到王雪莲教育基金支持。

会,即使得不到其他国家的帮助,任一国家也都会竭尽全力来应对。那为什么有些情况,如应对气候变化,国家间的合作动机就难以形成呢?我们能否对人类面临的其他问题也像对付小行星撞击那样精诚团结呢?这便是斯科特·巴雷特 (Scott Barrett) 在《合作的动力——为何提供全球公共产品》^① (以下简称《合作的动力》) 一书中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该书通过对大量案例的解读,将全球公共产品细分为不同类型,以实证的方式证明:对于不同的全球公共产品,合作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制度的改进将促进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

一 相关学术脉络

一般认为,对公共产品的研究从 18 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大卫·休谟在 1739 年出版的《人性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公共草地积水的例子,认为集体共同消费的物品单纯依靠个人无法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② 18 世纪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产品作出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划分,认为政府必须承担提供国防、司法和公共工程等产品的职责,这“实际上也就对公共产品做了一个初步的分类”^③。1954 年,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④ 一文,率先给出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并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萨缪尔森将当时已成为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序数效用、无差异曲线、一般均衡分析和帕累托效率等运用到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分析上来,开创了公共经济学。他的研究界定了公共产品的三个基本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

① Scott Barrett, *Why Cooperate? 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该书中文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 2012 年 10 月出版发行。

② 大卫·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 578—579 页。

③ 许彬《公共经济学导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 8 页。

④ 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6, No. 4, 1954, pp. 387–399.

20 世纪 60 年代后，对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从国内领域拓展到国际层面，其中普林斯顿大学的曼瑟尔·奥尔森和哈佛大学的理查德·查克豪泽 1966 年的论文以“美国为什么愿意为北约承担巨额成本”为问题，提出了一个基本模型，认为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愿意为大联盟承担这一成本。^① 1971 年，奥尔森进一步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合作激励的问题，提出了“国际集体产品”（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Goods）的概念。^② 美国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将公共产品理论比较全面地引入了国际关系领域，他在《1929—1939 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提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来承担“公共成本”。1986 年他进一步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共产品现象，认为国际领域与一国国内开放的市场经济一样，也存在公共产品。他提出了三类国际公共产品：和平，经济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开放的贸易体系、国际货币以及固定的汇率，开放市场的维持。^③ 在国际关系领域，公共产品的观点被罗伯特·吉尔平发展成“霸权稳定论”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以国际公共产品是国际社会有序运行所必需的和国际公共产品总是面临不足为大前提，以霸权国家有能力和意愿供给国际公共产品为小前提，推出霸权国家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金融、贸易和国际援助等国际公共产品，来获得其他国家对国际秩序的认同，从而实现体系内的稳定和繁荣。^④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全球治理问题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全球公共产品概念也应运而生。国际组织和部分发达国家对全球公共产品表现出颇高的热情。1999 年，英格·考尔等人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研究了面向 21 世纪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合作问题，以及联

① 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8, No. 3, 1971, pp. 266–279.

② Mancur Olson, “Increasing the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4, 1971, pp. 866–874.

③ Charles P.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1, 1986, pp. 1–13.

④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联合国在一个多角色世界中管理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考尔等人比较完整地给出了全球公共产品的定义,即那些能使多国人民受益而不只是某一人口群体或某一代人受益的产品,并且在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以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公共产品。^①这是全球公共产品迄今为止被最广泛认可的概念。2003 年,英吉·考尔等人又出版了《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一书,进一步推动了对全球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②

斯科特·巴雷特便是《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一书的作者之一。作为全球化问题和环境问题的资深学者,他具有英美双重国籍,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曾在伦敦商业学院、伦敦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任教或从事研究,也曾至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及地球研究学院。除了参加英吉·考尔领衔的小组,他还参与了其他关于全球公共产品的科研项目。2003 年 4 月 9 日,法国和瑞典签订协议,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行动小组,巴雷特应邀作为顾问参与了这项研究,向该小组提供作为其报告背景资料的素材。在该小组主任暨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内斯托·柴迪洛(Ernesto Zedillo)的建议下,巴雷特整合相关素材并写作了《合作的动力》一书。

二 《合作的动力》一书的主要内容

除引言与结论外,《合作的动力》一书共分为 7 章,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的 5 章(第 1、2、3、5、6 章)分别解析了不同类型全球公共

① Inge Kaul et al.,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

② Inge Kaul et al., eds.,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Managing Glob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英吉·考尔等编《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张春波、高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产品，第4章探讨了全球公共产品的融资问题，第7章研究全球公共产品对贫穷国家的供给问题。全书大部分篇幅是在介绍、解析不同种类的全球公共产品，并力图通过对各类全球公共产品的深度解析来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其关注的问题包括：什么是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全球公共产品能够被提供，有的却难以提供；如何促成实现国家合作来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应对实现国家合作的国际制度做哪些改进。正是通过具体的案例，这本书展示了国际合作的复杂性，揭示了在不同的全球公共产品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动机博弈。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类型

《合作的动力》一书从是否需要国际合作这一功能性要件出发，将全球公共产品分为五类。

1. 单一最大努力型。这类公共产品通过某个单一的国家就能提供，即使存在搭便车动机，国家之间不能达成合作，单个国家也会倾尽全力来提供此类产品，例如阻击小行星撞击、获取关于粒子物理学的知识、维和行动、发明治疗传染病的疫苗等。通常来说，大国更有可能提供单一最大努力型的公共产品，但单一国家的努力也有可能带来新危险，有可能更有利于提供者而伤害到部分国家，有时减少此类公共产品的提供也许会更有利。^① 不存在通行规则来对此类问题进行管理。这类公共产品通常是由较发达的大国或者中等国家提供的，但小国和弱国也有足够的动力来提供。

2. 最薄弱环节型。这类公共产品依赖于全球所有国家参与合作，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弱小国家的缺席都可能导致行动失败，而且这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取决于贡献最少的国家。最薄弱的环节通常是那些失败的国家，如根除传染病、确保核材料和生化材料的安全保管、保护禁渔区等。对于此类公共产品，部分国家会无能力提供，部分国家缺乏提供的动机，

^① Scott Barrett, *Why Cooperate? 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 p. 46.

需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合作模式。每个国家能实现的只是供给这些全球公共产品总收益的一小部分,如果各国都认为单独行动会有所损失,则可能需要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监督激励机制。一旦各国在确保了所有其他国家都将发挥其作用时,就会产生进行合作的动机。消灭天花被视为世界迄今最成功的集体行动。

3. 联合努力型。这类公共产品基本上只能依赖于国际社会的集体努力,但部分国家不参与的部分仍可由其他国家补偿提供,不过这样一来就很容易造成搭便车的状况,这也造成了这种公共产品很难得到供给。典型的产品如保护臭氧层和减缓气候变化。前一种情况,全球合作取得了成功;后一种困境迄今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巴雷特对环境领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认为,造成保护臭氧层和减缓气候变化两个案例出现迥异后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搭便车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国家克服它的能力。他也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将会是世界上最难解决的问题,各国之所以对减缓气候变化持消极的态度,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气候变化还没有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其次,气候变化是渐进式的,在某些阶段甚至会对一些国家有利;再次,减缓气候变化行动意味着大量投资或者损失投资机会,从成本-收益角度上来说可能不合算;最后,搭便车动机会抵消各国共同努力。他认为,并非单个原因阻碍了全球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而是四个原因的共同作用使减缓气候变化变得非常艰难。

4. 相互限制型。这类公共产品不需要共同去做什么,而需要共同不采取某些行动。例如,共同地不发展核武器、不克隆人类、禁止改变人类遗传基因等。但各国对以上三种公共产品存在着不同的动机。在发展和拥有核武器方面国际社会目前只能说是幸运的,但前途不容乐观;大多数国家禁止生殖性克隆;各国不可能同意禁止一切形式的遗传性基因改造,但可能会同意禁止一些形式的干预。

5. 协调型。各国遵守共同的规范或者标准,就构成了此类公共产品。例如时区、经纬度、度量衡等。每当国家具有强有力的协调动机时,标准

就会随之出现。相对于其他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全球标准的供给会更容易。它们不需要资金支持,而且一旦建立,它们就很容易维持。以格林威治作为零度经线和选择时间标准就是历史的自然选择。

各类全球公共产品的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全球公共产品的分类

	单一最大 努力型	最薄弱 环节型	联合 努力型	相互 限制型	协调型
供给取决于...	单一最大(单边的或集体的)努力	最弱的个体努力	所有国家总的努力	没做出努力的国家	从事相同工作的国家
例子	小行星防御、知识、维和、从源头压制传染性疾病的爆发、地球工程	疾病的根除、阻止抗药性和新型疾病的出现、核材料的保管、商船注册国的变更	减缓气候变化、臭氧层的保护	不使用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 禁止核试验和生物技术研究	时间测定、油轮和汽车的相关标准
是否需要国际合作	是的,在很多情况下,用它来决定什么该做,哪些国家该支付	是,用以建立普遍的最低标准	是,用以确定实现一个总体的结果所需的个人行动	是,用以对哪些国家不应该做的进行协商	是,用以选择一个共同的标准
是否需要资金和责任分担	是,当集体供给公共产品时	是,在某些情况下	是,使工业化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	否	否
协议的执行是否具有挑战性	通常不	是,除了供给只需要协调时	是	是	否,虽然参与需要通过一个门槛
供给性的国际制度	在一些情况下是条约;在其他情况下是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	共识(世界卫生大会)或安理会的决议,习惯法	条约	条约、规范、习惯法	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在某些情况下是条约

资料来源: Scott Barrett, *Why Cooperate? 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 p. 20.

(二) 融资问题

目前关于全球公共产品的研究事实上存在两大分支,一个是国际政

治经济学方向,另一个是国际公共财政理论。^① 融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成败。并非所有的全球公共产品都需要融资,按照作者的分类方法,单一最大努力型、最薄弱环节型和联合努力型的公共产品需要融资,但相互限制型和协调型公共产品是不需要融资的。

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即使有国家愿意单方面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必需的。这是因为单方面所做的决定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应,而这些决定却不一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因此,愿意单方面为此类行动提供资金的国家也会从国际合作中受益。它们的行动不只会因获得其他国家的批准而被授予合法性,同时它们还将获得其他国家的帮助,从而减轻一部分财政负担。

在其他国家不提供资金的情况下,如果有国家愿意为所有成本支付费用,此时融资就是最简单的。然而,即使在此条件下,也不能保证取得全部的资金。纵然有国家愿意单方面为一项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但它还是会希望其他国家支付,确实它可能也会认为其他国家有责任提供资金。因此,融资问题才常常需要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讨论。

与个人缴纳税收所采用的强制方式不同,各国的财政捐款将不会运用相同的强制方式。只有当各国同意采用这种方式,捐款才会被强制执行。但是即使是这样,捐款数额也要通过内部讨论决定。只有提出的数额很小时,一些国家才可能同意采用强制的分摊比例。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国际融资都真正遵从了自愿原则。强制捐款仅仅会对各国应该捐款的款项有意义。假如有国家对此明确表示同意,强制捐款便会加强该国缴纳一定数额捐款的责任。对不付款国的处罚(如会丧失其在大会上的投票权)可能也会有所帮助,尽管这些处罚必须是有效可信的,但实质性的处罚却往往不尽如人意。融资所采取的措施

^① 王国清、肖育才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学术轨迹及其下一步》,《改革》2012 年第 3 期,第 143 页。

(如筹集一项启动资金以减少全球公共产品的最终成本的措施)可能也会起一定作用,但这常常还是不够的。

(三) 穷国与全球公共产品问题

作者在书中探讨了国家范围、区域范围内的公共产品,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关注到了穷国提供与享受全球公共产品问题,并将之延伸到道德讨论的层面。作者认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依赖于大国、富国和强国,大国的行动决定穷国是否能从中受益。例如,每个国家都能从根除天花中受益,但受益最多的国家是最弱和最贫穷的国家。

国家范围的公共产品有时也可以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替代品。例如,各国在国内根除天花就是在全球层面上根除天花的替代品。由于大国、富国和强国是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应商(如根除),因此这就可能会挫伤它们供给全球公共产品(如根除)的动机。假如真发生了这种状况,那么穷国和弱国将会损失惨重,原因在于它们通常无法或不愿提供国家范围的公共产品以弥补这方面的损失。一些全球公共产品有着相反的属性,因此成为国家范围公共产品的补充。许多穷国和弱国都缺乏这些国家范围的公共产品。因此,它们从许多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只获得很少的收益。即使承诺采购新型疫苗的收益远远会超过其成本,还是有国家会不愿意这样做,因此这些国家的公民的身体状况并无法得到改善。

大国、富国和强国缺乏供给只对发展中国家有益的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公共产品的动机,如对一些疾病的治疗。要想使这些产品得到供给,其方式可以是两种:来自穷国和弱国自身的领导;或采取措施干预并改变大国、富国和强国的动机,使它们出于同情而提供。但同情肯定是不足以成为公共产品提供的有效理由的,自身利益通常是更为可靠的动力源泉。

作者认为,人类的进步需要的不只是改善促进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国际制度,而且也需要有效的国内制度,为此作者在书中还讨论了主权、善政等问题。

(四) 国际合作

合作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基本问题。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都认为合作是可能的,但对于合作的本质和如何实现合作,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现实主义对于合作的可能性最悲观:经典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新现实主义认为在面临外在威胁的情况下国家之间可以合作。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相信进化论,相信国际组织的作用,认为国际机制能促进合作。^① 博弈论被认为是解释合作问题的现实而有效的工具。也有学者通过对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合作问题的研究,证明在国家间及其他行为体之间合作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②

通过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集中分析,作者对合作做出了典型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解答。他认同国家是自私、理性的行为体,其目的是追求绝对收益。国际合作有利于各国利益,由于存在动机的冲突,国家的合作难以达成。^③ 但作者抱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思路,即他坚持认为,世界是可以合作的。世界各国都有单边行动的动机,但各国也有为所有国家的利益而进行合作的动机。悲观主义者会从失败的案例中总结出失败不可避免的结论,而乐观主义者能从成功的案例中得出成功是可以复制的经验。

巴雷特在该书开篇和结尾均提出了一个并非不可能发生的场景,即试想一颗小行星即将撞击地球。^④ 他认为,国家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也存在利益的一致,通过对五类全球公共产品的解析,可以看出,进行合作的动机是广泛存在的,但供给各类公共产品的动机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例

①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Robert Axelrod,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Scott Barrett, *Why Cooperate? 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 p. 197.

④ 事实上,研究者估计至少有两万颗直径在 500 米及更大一些的天体的运行轨道与地球轨道相交。科学家已经证实了直径 10 公里及以上的小天体对地球的撞击已经发生过多次,而且预言以后也必然会再发生。参见戴维斯《宇宙的最后三分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第 2 页。转引自赵河清《从潜人到星际人——人类诞生及生存方式跃迁原理研究》(下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第 407 页。

如，相互制约型比协调型的公共产品就更难维持。各国为了求得自己的利益而寻求合作，其主要途径就是建立和维持国际制度。国际制度的效用在于削弱国际无政府状态，减少合作的不确定性和成本，最终帮助各国实现共同利益。成功的国际制度（如《蒙特利尔议定书》）会重组这些动机，促使各国改变游戏规则，因此使合作的动机超越了单边行动的动机。

作者通过非常具体的案例，深入浅出地采用了博弈理论和功能理论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其中一些成功的国际制度设计，例如《蒙特利尔议定书》和《控制船舶污染协议》，重塑了国家动机，改变了游戏规则，所以合作的动机超越了单边行动的动机。但不幸的是，许多国际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先天的缺陷，甚至一些看起来很好的制度也造成了无法避免的悲剧。例如，由于被主权制度束缚，国际社会对苏丹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束手无策。同时，部分国家主权范围内国内治理的失败不但导致了国际公共产品不能被提供，也导致了其国内民众利益的受损。^①

虽然没有直接总结，但作者的最主要结论可归纳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国际制度的不健全（包括制度缺失和制度不合理）阻碍了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改进将促进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

三 《合作的动力》一书的贡献与不足

（一）有关启示

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合作的动力》一书未拘泥于纯粹的逻辑分析和学理思辨，它从动机分析入手，通过具体案例的深入研究，运用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抽丝剥茧地厘清了各类公共产品，揭示了全球公共产品的复杂性。正是基于对具体案例的解剖，解释了为什么通过国际合作能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却不能提供另一些公共产品，国际合作的瓶颈何在，如何通

^① Scott Barrett, *Why Cooperate? 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 p. 189.

过制度设计来强化合作的动机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具体来说, 该书的贡献可以包括两个层面, 即学术层面和政策层面。

首先, 该书的实证风格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范式。粗略统计一下, 《合作的动力》一书 70% 以上的内容都在描述和解析案例, 即使是从案例的丰富性来说, 也足以可认为是极富价值的案例库, 能为同类问题的研究提供广泛素材。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逻辑分析和学理论证是基本方法, 但往往会导致结论多具有单一性。而该书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大量类型各异的案例, 充分揭示了动机问题的复杂性, 正是因为对于案例的探索, 能够发现更多环环相扣的问题, 这是脱离了案例的纯理论很难做到的。例如, 在《合作的动力》一书中, 作者探讨了欧洲核研究中心进行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的问题, 这一实验致力于寻找希格斯玻色子, 无论发现与否, 都将提供人类知识的公共产品, 但这一实验也将带来毁灭地球的风险。^① 因此这带来一连串的问题: 我们真的想进行这项测验吗? 我们是否确信这项新知识能超过它的危险性? 该由谁来决定实验是否继续? 欧洲的行动是否应该咨询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也该拥有否决权吗? 对案例探索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困惑在学术上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 该书对于许多有待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了有益的政策思路。作者通过研究得出结论, 所有合作的可能性并无根本的障碍, 是能够被达到的。在此基础上, 他提供了诸多政策建议。例如, 与一些学者从根本上否定《京都议定书》的态度不同, 他认为应通过对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 修正、设计一个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协议体系。《合作的动力》一书对于气候变化协议、消除传染病、联合国改革等问题都提出了政策主张。作为学者, 应该关心社会问题, 时刻与社会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 不但研究事实, 揭示规律, 也为社会指明出路。从这方面来说, 该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当然, 一定条件下, 理论研究有必要和现实拉开

^① 2012 年 7 月 4 日, 欧洲核研究中心宣布, 发现与希格斯玻色子特征相吻合的例子, 这将是科学发展史上载入史册的事件。不过幸运的是, 没有出现科学家们所担心的风险。

一些距离，但对于国际关系尤其是全球公共产品这种现实性很强的课题来说，研究也许是更要拉近距离的。而研究成果要能被政策制定者接受，也有必要尽量做到研究成果具体、透明、清新，结论明确有力。《合作的动力》一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各章既独立成篇，又构成一个有机的前后呼应的整体。与其说该书是专门的学术论著，毋宁说它更像是一本大众畅销读物，这意味着它有可能被更多的读者包括政策制定者和谈判者读到。

最后，该书还将事实、科学和价值判断融合在一起。对于公共产品难以实现有效供给的原因，经济学界已经诞生了许多让人悲观的理论，其中著名的有“囚徒困境”模型、“公地的悲剧”模型和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等。^① 这些理论反过来又为公共产品难以得到供给的现象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客观上为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尽全力履行责任提供了理论的根据。在“囚徒困境”模型中，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这一假定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很难被反驳的常识，任何参与者理所当然地都应该是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会去关心其他参与者的利益。在“公地的悲剧”理论模型中，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力阻止其他人使用，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界定产权的交易成本太高）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而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因此变得非常艰难。反映在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合作将面临“共同利益困境”和“共同失利困境”的挑战。^②

与悲观的理论模式不同，巴雷特坚持认为，对公共产品进行供应的动

① 参见李成威《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评价与激励》，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②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9–53;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80—282页。

机一是广泛存在,二是这种动机是复杂的,三是并非完全固定的,制度可以对它们进行塑造和重新定向。例如,美国已经证明具有单方面的动机,提供识别和阻止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全球公共产品,但即使在美国已经大量投资于这项公共产品的情况下,欧盟和日本仍然参与进来。这一事例证明搭便车并不是国家的天然动机,不必然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造成阻碍;而深入地研究发现,其他国家可能是希望借此发展其本身能力,或者只是因为不信任美国。这也充分地证明了动机的复杂性与不可捉摸性。

作者认为,导致全球公共产品失败的根源很多时候不在于困境的无法解决,而在于制度设计的不够合理和科学。他同时认为,人类进步需要的不只是改善促进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国际制度,而且也需要有效的国内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该国充分利用和广泛共享该项供给的收益。作者关于国际机制的研究启示我们应该同样检讨国内政策。与国际机制的缺失相比,国内政策的不科学、不合理是更容易发现的现象。在主权国家中,政府对于社会领域中的违法现象往往倾向于颁布禁止性规范,这已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了,但却未必能够奏效。例如,发现有人在羊肉中掺杂狐狸肉后,政府立即发布禁令,并且加大处罚力度,但并没有解决狐狸肉往哪里去的问题,因此很难杜绝狐狸皮毛厂商非法处理狐狸肉的动机;反之,在禁止的同时,如果能够研究并推广狐狸肉的合法加工手段(如药用、腊制等),使狐狸肉甚至取得了比羊肉更高的价值,这样便能有效消除狐狸皮毛厂商的违法动机,激励机制自然而然地就建立起来了。

难能可贵的是,《合作的动力》一书字里行间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作者表示,我们之所以要关心全球公共产品,是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福利和子孙后代的福祉,关系到地球未来的命运。^① 作者认为,经济分析必须将伦理纳入考虑范围,方案的制订必须体现价值观。我们不但要衡量我们自己的幸福指数,也要衡量未来人类的幸福指数,因此为公平起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未来的贴现度应更低,富国更应承担更多责任。作者的忧

① Scott Barrett, *Why Cooperate? 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 p. 1.

患意识和严谨的研究精神无疑是会给读者以强烈感染的。

笔者认为，该书的基本理念是非常有价值的。对全球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为前提，并期望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实现目标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但无政府状态的前提之上应该还有一个前提，即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否正义？这是制度理论中最根本性的问题。在当代国际社会，财富的爆炸式累积和贫穷的快速增加是同时发生的，全球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此，在一国之内不同阶层也是如此。因此，即使理论上全球公共产品能带来具有全球范围的利益，现实中受益者也只能是全球民众中的部分人。如互联网带来了通信的便利，但其不菲的费用（包括终端成本、网络和电话费等）仍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与此类似，像疟疾、霍乱、肺结核、艾滋病等全球公共害品（global public bads）主要在非洲等不发达地区传播，如果不加以防治而任其传播的话，穷人遭受的痛苦也远比富人的多。因此，在进行全球公共产品研究中，这一视角是必不可缺的。

事实上，不少学者都对《合作的动力》一书给出了好评。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里兰大学教授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评价认为“巴雷特对国际合作的不同动机做出了简单而且有力的解构，这本书在有关合作的博弈理论上力争做出最明晰、最有价值、最容易理解的令人激动而且有益的努力。”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教授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认为该书“将在政策制定和研究领域开辟新途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格迪希·巴格瓦提（Jagdish Bhagwati）表示，“巴雷特的著作应成为一个经典”。

（二）该书存在的不足

首先，对各类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过程仍缺乏多层面的考察。作者仍坚持了国家是单一和理性行为体的假定，没有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研究也仅限于国家。全球公共产品与国际公共产品概念是存在区别的，而重要区别之一即在于提供前者的主体更多

元,而非仅限于国家政府。事实上,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国内和国际因素反复博弈的过程。从供给主体的内部决策来看,一方面,政策制定者的偏好通过机构设置来影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目标函数;另一方面,选民的偏好和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也会对供给主体的函数产生影响。从国际层面来看,全球合作参与主体越来越多,主权国家政府、政府间组织、全球公民社会、跨国公司乃至个人都加入进来。其中,国内偏好、外部偏好、政治压力和激励机制都是影响全球层面多主体供给决策的重要因素。全球公共产品的政治程序与生产程序错综复杂、反复循环,往往会导致其谈判过程一波三折。从数量上来说,该书案例丰富,但就具体案例来说,其解析的截面仍然是很有限的。

其次,关于全球公共产品的分类标准不明晰。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非常宽泛,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全球公共产品进行了五花八门的分类,如根据竞争和排他程度,将全球公共产品分为全球纯公共品、全球非纯公共品、全球俱乐部品、全球联合产品;从供给的角度分为全球自然共享品、全球人为共享品;根据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将之分为连续的全球公共产品、离散的全球公共产品、二元的公共产品;等等。^①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千年宣言》执行情况的《路线图报告》列举了尊重国家主权、全球和平等 10 种全球公共产品。^②此外,英吉·考尔按照公共性的三角结构对全球公共产品做出划分,将之区分为决策不完全具有公共性的全球公共产品、外部效应不断扩展的地区公共产品等四类,^③逻辑性更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全球公共产品做出与众不同的

① Jack Hirshleifer, "From Weakest - link to Best - shot: 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Public Choice*, Vol. 41, No. 3, 1983, p. 372; Te Velde, O. Morrissey and A. Hewitt, "Allocating Aid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n M. Ferroni and A. Mody, eds.,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ncentives, Measurement and Financing*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英吉·考尔等编《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

② United Nations, "Road Map towa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 General*, September 6, 2001, A/56/326, <http://www.un.org/documents/ga/docs/56/a56326.pdf>.

③ 英吉·考尔等编《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第 82—92 页。

分类也是《合作的动力》一书的理论贡献，但作者在书中没有对这种分类进行解释与说明，因此其确切标准是什么仍难以确定。作者在书中对不同种类的全球公共产品缺乏横向的比较研究，这种分类是否足够科学，也是值得继续研究的。

最后，该书理论性存在欠缺。这也是以整体全球公共产品为研究对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公共产品概念的提出，在政策意义上具有重大意义，能使国际社会将视线从一己的国家利益中拉出来。但从理论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承载量太大的术语，因为其种类太多，而且已经被过于滥用了。越是被广泛使用的术语，就越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分歧和混乱，这不但导致了人们在日常使用中的讹误，也导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有歧见或者有失偏颇。在中文中，对于“public goods”一词的翻译出现了公共产品、公共物品、公益物品、公益品、公共品、共用品等多种翻译，相应地也出现了理解上的歧义。各类公共产品的特征差别太大，如果把它们简单地归在一起，实际上也是不利于深入研究的。例如，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各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就是一种公共产品；为减缓气候变化寻求能源技术的开发与运用，这种技术的标准也是一项公共产品；而当温室气体的浓度上升到某一水平时，人类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来调整气候，这又是一项公共产品。这便使减缓气候变化行动诞生了多个公共产品。《合作的动力》一书提出的是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背后的动机问题，动机是是否进行合作的主观意念，这一问题应该说是让人激动又具有理论挑战的课题，但全书最终并没有对动机问题进行集中解答。^① 全书的研究方法以案例研究法为主，运用了博弈论、归纳法、比较分析法，但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说，案例选择的数量并非多多益善。^② 该书最大的硬伤是在案例比较分析中没有进行严谨的变量控制，所以也并没有得出鲜明的结论。

① 这也是笔者对该书标题的翻译没有直译“动机”一词的原因。

②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114页。

四 结论

《合作的动力》一书可能会是全球公共产品研究中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通过学术脉络的梳理可以发现,“霸权稳定论”的提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移用公共产品概念的一个关键点,它大大激发了学界对国际公共产品的研究兴趣,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由此应运而生。关于全球公共产品的研究只有 10 余年的时间,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持续深入仍需要大量基础性成果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以其实证研究的成就,可看做一部奠基性的著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随着“霸权稳定论”被质疑和批判(也许其中还伴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公共产品作为这一理论的前提不排除会被重新界定和解构,甚至也有解体的可能。

在《合作的动力》一书中,巴雷特通过丰富的案例向我们揭示了全球公共产品涉及领域是如此广泛,差别如此巨大,其生产和提供是如此复杂,以致笼统的研究是很难得出具体结论的。公共产品研究起源于国内经济领域,事实上,现在对国家范围内公共产品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但从全球角度的研究却没有什么起色。根据笔者的考察,自《合作的动力》一书出版以来,国际学术界尚未发现新的有影响力的关于全球公共产品研究的专著,这是由全球公共产品概念外延过大所造成的。理论往往根据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目前国际社会多边主义正处于撤退状态,该书部分地揭示了原因,也部分地给出了解答,但对未来的启示还很难说具有突破性。这也是一种时代的局限。在全球公共产品大的框架下,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也许是更为明智的思路。因此,《合作的动力》一书到底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还是一部终结性的作品,有待时间的证明。

作者简介

王 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10210170049@fudan.edu.cn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著有《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Routledge, 2011)、《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 防御性现实主义》(Palgrave Macmillan, 2010) 等。

电子信箱: twukong@gmail.com

郭 扬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著有《军队创新体系》(合著, 2002 年), 译著有《军事力量对比》(合译, 2002 年)。

电子信箱: gygfdx@sina.com

谢 超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2008 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2004 年在哈尔滨理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xiechaocn@gmail.com

李少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09110170017@fudan.edu.cn

黄智虎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2010 级博士研究生, 商务部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副处长。

电子信箱: 15011039927@139.com